

★ 郭颖 主编

20世纪谍海传奇人物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世纪谍海传奇人物

郭 颖 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著名间谍传奇人物/郭颖等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12

ISBN 7—80137—001—5

I. 20… II. 郭… III. 谍报—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世界
N. K81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122 号

责任编辑: 张 健 封面设计: 杨卉如

出 版 者: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印 刷 者: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

发 行 者: 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处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37—001—5/E·001

定 价: 11.50 元

(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

目 录

-
- | | |
|-----|---------------------------------|
| 1 | 在东京的德国记者
——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 |
| 18 | 男爵身边的百灵鸟
——法国间谍玛尔塔·里舍 |
| 30 | 妖女祸华录
——日本间谍川岛芳子 |
| 41 | 一仆三主
——三面间谍保罗·蒂默尔 |
| 61 | 谍报名星
——德国间谍华特·施伦堡 |
| 75 | 功勋间谍
——原苏联间谍哈罗德·菲尔比 |
| 99 | 风流女谍
——英国间谍艾米·索普·帕克 |
| 110 | “红色乐队”奏出的乐章
——原苏联间谍利奥波尔德·特雷伯 |
| 120 | 双面幽默大师
——双重间谍塔特 |

- 136 谜一样的影后
——好莱坞影星葛丽泰·嘉宝
- 142 文洛谍影
——英国间谍贝斯特和史蒂文斯
- 156 西西里岛大骗局
——双重间谍普霍尔·加西亚
- 163 九死一生的女记者
——英国女谍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
- 167 D 日反攻大圈套
——英国间谍达斯科·波波夫
- 185 春潮楼的常客
——日本间谍吉川猛夫
- 195 多顿夫人的夜总会
——美国女间谍多顿夫人
- 200 为犹太人工作的美人
——犹太女谍约兰德
- 207 阿纳姆惨案的背后
——荷兰反间谍专家奥雷斯特·平托
- 223 “铁砧行动”功臣
——美国间谍艾琳·格里菲斯
- 245 误中反间计的蛇蝎
——美国间谍斯蒂文
- 254 总理身边的鼯鼠
——原东德间谍纪尧姆

在东京的德国记者

——原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

在黛绿蕴茵的东京郊区，有一座幽雅静谧的多磨陵园。园里挺拔的松树和粗壮的柳杉之间，一块简朴的花岗石墓碑上，用日文和拉丁字母刻着：

理查德·佐尔格

1895-1944

墓碑的背面刻着一段简短而庄重的碑文：

“这里安息的是一位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1895年生于巴库。1933年来到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就义。”

碑文向人们昭示了一个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国际间谍佐尔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一)

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10月4日出生在高加索地区巴库油田附近的幽静小镇阿基堪德。他的父亲韦尔汉姆·理查德·佐尔格，雅利安人，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德国工程师，他的母亲尼娜·科别列夫，比他父亲年轻得多，是俄罗斯人。或许因为如此，佐尔格一生都与德国和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佐尔格在家中排行最小，倍受父母宠爱。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里，他渐渐长成一位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思想，成为泛德主义者，不加

批判地爱国。因此，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佐尔格毅然离开学校，在柏林的征兵站自愿报名参军。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佐尔格曾两次负伤，由于他作战勇猛，被德军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佐尔格第二次负伤很重，两条修长的腿都被弹片打折，落下终身跛疾。在医院养病期间，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的思想起了极大变化，内心的矛盾促使他反思战争的过失，一改年轻人的幼稚冲动为成熟练达。此间，他渐渐接触了一些德国和俄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典著作，从此开始了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历程。

1918年1月，怀着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渴求知识的欲望，佐尔格正式退伍，就读于基尔大学。在大学左翼教授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毕业后，佐尔格便投身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1922年初，经过德国共产党批准，佐尔格携新婚妻子克里斯蒂阿尼前往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当时的法兰克福是德国商业、文化中心，也是经济、文学、艺术试验中心。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佐尔格注意发展周围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参与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抨击时政，宣传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佐尔格人品的凝聚力，以及出色的工作能力，不但受到了德共中央的重视，也引起了苏共的注意。1924年10月，苏共正式邀请佐尔格前往工作，赴莫斯科参与筹建苏联国际情报处。

从此，佐尔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翻开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页。当时，他只有30岁。

(二)

苏联红军四局，隶属于情报部，受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主要任务就是在国外建立情报网、间谍小组和通讯联络。佐尔格

就是这个局的新成员，从此开始了职业谍报员生涯。

1929 年底，佐尔格和他的两名苏联同事一起被派到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这里将是他间谍生涯的第一站。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国内外各种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影响。而在发达经济的背后是中外剥削者、吸血鬼伸出的魔掌，是老百姓贫穷、痛苦的呻吟。在歌舞升平的公共租界，充斥着外国侨民、中国商人、银行资本家、工厂工人，以及聚集在一幢幢白色洋房里的阴谋家们。但是，繁华的大上海也被称为中国城市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正因为如此，1929 年的上海也引起了苏联情报部门的注意。佐尔格一行到中国的任务，就是研究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政治结构，特别是搜集军事力量的各种情报，同时还研讨英美的对华政策。换言之，佐尔格应以政治观察家的目光来审视中国，为苏联政府提供情报，以便其正确制订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

1929 年 12 月初，在一艘开往上海的游轮上，一位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时常出现在甲板上。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会对他英俊的外貌留下深刻印象：修长的身材，大脸盘，一双蓝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道剑眉透出东方式的豪侠英气。他那运动员似的宽肩膀上套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旅行装。一绺栗色的头发遮盖了宽阔的前额，他就是佐尔格。

船到上海，他和两个同伴住进了南京路一家高级旅馆里。也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佐尔格结识了住在同一旅馆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她对苏联驻上海情报小组的建立发展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佐尔格最亲密、最得力的合作者，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就是由史沫特莱介绍认识的。

在中国，通过佐尔格的努力，苏联情报网情报来源不断扩大。一名干练的小组外围成员、日本记者川井定吉曾前往东北、华北，搜集到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包括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未

来发展情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即关东军的态度；白俄、回、蒙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反应；北方边境地区对苏联的舆论。佐尔格根据手下成员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写成了详细报告，于1932年初转手哈尔滨，送交莫斯科总部。苏联情报部门对此大感兴趣，对佐尔格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予以肯定和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佐尔格的多数情报是通过他与欧洲人的私交得来的。在佐尔格的口袋里装着一张真正的德国记者证，是德国《农业报》聘他撰写系列文章时发给他的，佐尔格正是以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身份作掩护，以采访的名义，广泛结交欧洲记者同行、德国商人，甚至是大军火商，还有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这些关系，特别是同领事馆的交往，成为他日后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

1932年12月，佐尔格出色地完成了在中国的任务，将小组交给别人接办，自己则奉命返回莫斯科。

(三)

佐尔格在中国的出色工作，引起了苏军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注意。他热情地邀请这位谍报英雄到自己家中作客，设宴以款待。席间，酒兴正酣的别尔津一改往日严肃寡笑的风格，同佐尔格畅所欲言。他随口问客人：

“您对将来有什么打算？将来。”

“我没想好”，佐尔格对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也许是中国的华北或东北。”

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说：“或许东京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几天之后，在别尔津的办公室里，佐尔格接受了新任务，到日本去，“密切注视满洲事变后日本的对苏政策，同时认真研究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个问题”。

当过间谍的人都清楚，日本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很强、十分排外的国家，去日本充当战争间谍是万分困难而危险的。佐尔格却像以往一样接受了任务，他是个天生的冒险家。

在情报局的精心安排下，一个月后，已对日本各种情况有所了解的佐尔格踏上了绕道德国的旅程。在柏林，这位“熟悉远东事务的记者”首先申请了一张新德国护照，使外人从履历上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

佐尔格在柏林的八个星期，可谓收获颇丰。他首先与《交易所报》、《每日展望》两家报纸订了合同，负责从日本给它们寄新闻稿件。《每日展望》的主笔策勒博士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主动为佐尔格介绍了他在日本的好友尤金·奥特上校，德国驻日使馆助理武官，他成为佐尔格在日本的主要情报来源。佐尔格更大胆的一着是取得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刊物《地理政治》的支持，该刊编辑沃温克尔博士很爽快地给德国驻东京使馆的两名官员写了介绍信。此外，佐尔格还机敏地从柏林记者同行和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号那里广泛地搜罗了介绍信。荷兰金融报纸、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评论》也同意接受他定期从东京寄来的稿子。

为了情报工作的方便，佐尔格甚至申请加入纳粹党和新成立的纳粹记者协会。

佐尔格和日后在东京的主要报务员“伯恩哈特”在柏林秘密接上了头，他也是苏军四局的成员。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佐尔格绕道温哥华，乘船于1933年9月6日到达日本横滨，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历程。

(四)

东京是日本人心中的骄傲，而佐尔格却不大喜欢此地。到达目的地后，佐尔格立即换上西服，拜访了德国大使馆。在那里，他的名记者身份使他受到热情的招待。但在佐尔格心里却十分明

白，从他微跛着踏上日本海岸的那一刻起，日本警察局就已经盯上这位外国记者了，所以他必须谨言慎行。在情报小组尚未成立时，不能进行任何间谍活动。为此，他开始频繁出没东京的外国记者聚会点，增加人们对他的感性认识，减少日本人的戒心。

冬天的银座，天气阴冷潮湿，刺骨的寒风夹着雨雪。佐尔格被一群记者邀请到一个德国人开的小酒吧“金色莱茵”。他已经结识了许多记者、使馆人员和德国侨民会的会员。他们嘻嘻哈哈地向新来的朋友介绍东京的生活，包括小酒店里正宗的德国菜“油煎小灌肠加白菜”，他们大口呷着巴伐利亚啤酒，高呼“万岁！”碰杯，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这就是佐尔格初到东京时的生活。

不久，他的工作就有了起色，“伯恩哈特”也如期来到东京。佐尔格指示他立即办两件事情：一是立即着手在寓所内架设无线电台，二是代替佐尔格与小组的第三位成员武凯利克接头。

几天以后，在简陋的文化公寓里，“伯恩哈特”与武凯利克对着暗语：

“你认识约翰逊？”

“认识。”戴一副黑边眼镜的武凯利克点点头。

“我并不是，是他打发我来的。”

“你找对人了。”

勃兰利·武凯利克长得敦实而和善。在日本的公开身份是法国哈瓦那通讯社驻东京记者，南斯拉夫人，也是苏军四局发展的新成员。佐尔格因为顺利找到新组员而兴奋异常，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亲自看望他。临走时俩人已成亲密朋友，为解决武凯利克目前生活窘况，佐尔格给了他一大笔钱，足够他们全家过上后顾无忧的生活。几天后，武凯利克被佐尔格介绍给一些外国新闻团体、法国使馆高级官员，扩大了他的社交圈子，提高了结交层次，对日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1934年春天，佐尔格又顺利地与小第四名成员宫木佐德接上了头。宫木与武凯利克一样，是苏联情报机关在日本物色的

业余特工爱好者，而不是久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间谍。面对佐尔格提出的搜集日本政治军事情报的要求，宫木感到十分勉强，担心不能胜任。

其实，在佐尔格眼里，宫木并不是理想人选：他虽然是日本人，但从16岁起就到美国生活，因而对东京这个地方不很了解，当然也不可能与政府内部或军队的高级官员有什么来往，于是，佐尔格决定先不启用宫木，而是恢复和尾崎秀实的联系，他是佐尔格在上海认识的好友。现为大阪《朝日新闻》报社记者。

几天后，在奈良鹿苑的一个咖啡馆里，兴奋的佐尔格见到了老朋友尾崎。重叙旧情，加深了两人的友谊，佐尔格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对方。

“你再帮助我行吗？”佐尔格闪烁着蓝色的眼睛，诚恳地问道，“这次是日本，不是中国。”

尾崎毫不犹豫，向佐尔格伸出了手，他同意了。

尾崎的加入，加强了佐尔格间谍小组的实力。因为他在政界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由此，佐尔格可以获得更广泛、更准确、更重要的情报。佐尔格的信心也随之增加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小组正式工作，取名“拉姆扎”小组。

佐尔格的另一大情报来源是德国大使馆。当他怀揣着柏林《每日展望》的策勒博士写给奥特助理武官的担保信来到大使馆时，受到了热烈欢迎。相同的语言，类似的经历使他俩在异域成为关系亲密的朋友。佐尔格站在记者和远东事务专家的立场上，向奥特大谈特谈日本军事方面的最新情报以及日本国内的形势。这些内容真是帮了他的大忙，奥特将它们充实进了给东京武官的定期汇报，使之成为一份颇具份量的内参。不久，奥特因此被正式提升为武官，于1934年春调往东京任职。

在佐尔格的性格里，继承了母亲那种俄罗斯式的外向和开朗，对周围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除了大使馆里的朋友，佐尔格还结交了一位同行阿尔伯莱彻特·冯·乌拉奇公爵。此人不仅

在东京很有影响，而且在德国也与纳粹上流人物有联系，他本人是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驻东京的记者。

在乌拉奇公爵的引荐下，佐尔格很快融入了驻东京外国记者的社交圈子。除参加日本外务省每周举行的三次记者招待会外，还与军部、海军部等重要机关定期联系，往往能得到内部最新消息。此外，其他私人社交活动他也不轻易放过。在东京德国人俱乐部里，佐尔格能看到有关日本的权威外文书籍，还可以在昏暗热闹的酒吧间里倾听别人高谈阔论。当然，在东京的德国大使馆里，也经常可以见到这位英俊的记者，在档案室和事务参赞办公室里互通消息，交换看法。如果说他与新任大使德克逊的关系是不冷不热，那么随着交往增多，这种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尤其在正式加入纳粹党和纳粹记者协会以后，佐尔格在日本的地位更高了。

1934年9月，尾崎秀实被报社调回日本。他是佐尔格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与政府里的一些要人过往甚密，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首相的近卫公爵，元老院最老成员的后代西园寺亲王以及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秋，他是尾崎在东京大学的同学。这些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佐尔格在东京领导的间谍小组和间谍网已有些规模了，并已获取不少情报。但伯恩哈特的报务员工作不令人满意，必须换人。

为了找一个更好的无线电报务员，并向苏军四局汇报目前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1935年仲夏，佐尔格悄悄回到莫斯科。

（五）

这次莫斯科之行非常隐秘，没引起任何怀疑。佐尔格再次领命：分析日本对苏意图，防止日苏战争的爆发，并密切注视日德

关系的发展形势。佐尔格的另一收获是找到了克劳森，他在上海时的一位好友，后来成为他的报务员。

佐尔格再次回到日本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即一位少壮派军官因不满上层的派系争执而刺杀陆军省军事局局长。这次“以下犯上”的事件，使本已不平静的日本政局更加动荡，甚至危机四伏。刺杀者因得道多助，反而获胜。这件事大大激励了少壮派青年军官，终于在2月26日清晨发动了“二·二六”事变，两名前首相和一些陆军将领丧生。

这次事变，不仅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在佐尔格的间谍生涯中也可谓一个转折点。事变发生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尾崎便将事情的经过和可能发生的后果细细说与佐尔格，使他能洞悉前因后果，并推断出其后的深远影响。而在日本的其他外国记者则始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二·二六”事变了解和分析，根本不得要领。包括德国大使馆的人也请佐尔格替他们写一份向国内汇报的详细材料，说明此事。奥特还为佐尔格提供了一些内部机密材料，甚至允许他在大使馆拍摄文件。从这时候起，佐尔格就变成享此殊荣的特别记者。

“二·二六”事件是佐尔格间谍兼作记者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他正式开始完成在东京的任务。他给莫斯科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得出了“日本陆军将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正确论断，还就莫斯科最关心的日苏关系给予了满意答复：“日军今后将不断扩张，扩张的目的是中国而非苏联。”事实印证了他的推断。另外，他在《地理政治》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京的陆军暴动》的文章，成为迄今为止有关“二·二六”事变最出色的一篇论文。更为重要的是，他同德国大使馆，特别是与奥特的关系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甚至成为武官奥特上校的非官方秘书，在大使馆中设有自己的办公室。至此，他的掩护身份和秘密工作的基础均得到巩固，二者相得益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后。

“二·二六”事变后的一天，佐尔格像往常一样来到大使馆的办公室里。奥特走进来，语气严肃地告诉他，日德谈判正在柏林进行，谈判负责人是后来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柏林武官小岛及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利斯海军上将。佐尔格马上机警地问：“谈判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特耸耸肩膀：“目前还不清楚，我和大使是从日本总参谋部得到消息的。所以大使让你拟一份密码电报，发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

日德谈判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两个军事大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势必影响世界政局。关于柏林的秘密谈判，佐尔格还从哈克博士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哈克是个德国商人，在谈判初期充当了里宾特洛甫的代言人，他秘密来到东京，准备探听日方的真实想法和可靠程度。不久，佐尔格就得到哈克的信任。他告诉奥特和佐尔格，整个事情十分绝密，现在苏联间谍已开始监视参与谈判的主要人员，为此，他才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以免暴露三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没想到坐在对面的就是苏联著名间谍。

佐尔格从哈克的话里得出结论：日德协议将对苏联不利。果然，一次旨在联合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于1936年11月25日缔结了。

条约缔结后，佐尔格马上向莫斯科汇报了此事。报告参考了两份机密文件：一份是从奥特那里看到的，有关一旦日苏战争爆发，日本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详情，佐尔格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尚不具备与苏联为敌的实力；另一份是德国大使德克逊交给佐尔格的，该文件阐述了日本上层人物对日德协定的反应，从文件上看，东京政府各集团并不欣赏这个条约。

苏军四局得到这件情报后，对佐尔格出色的工作和敏锐的政治嗅觉给予了高度评价。

(六)

1937年夏天，以亲德著称的近卫公爵就任日本政府首相，这一人事变动给佐尔格的情报小组带来极大方便。佐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新任首相的中国问题私人顾问。

近卫首相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他们的聚会一般都在饭店的单间进行。女招待事先摆好了一大盘切成薄片的牛肉和蔬菜，还有各色调料，再放上两个烤肉锅，然后退下去让客人们自己用餐。这些“早餐客”——也就是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一边烤肉，一边进行密谈。他们讨论着国家各种大事，制订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往往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而在每次早餐用罢，尾崎都会跑到佐尔格那里，详细汇报一切有价值的情报。

1937年7月，一场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这个时期，武凯利克曾亲自来到中国北平，收集这场战争的第一手资料，还拍摄了许多十分珍贵的照片。武凯利克成为欧洲报道芦沟桥事变的第一人，也是佐尔格间谍小组在中国的主要情报来源。他向佐尔格提交了非常宝贵的报告，譬如：北平占领情况的写真，芦沟桥事变的情景以及日军的兵力部署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点，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还是欲与共产国际为敌，中国是实现其野心的跳板。

鉴于日军对苏联窥视已久，又与德国关系暧昧，大有日德结盟、共同反苏之势。因此，他向莫斯科发出一系列电报澄清此事，希望尽一切力量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

为了预防日军发动突然进攻而使苏军不知所措，佐尔格立即提供了有关日军对苏力量的分析情报，使得第二年关东军在诺门坎地区大规模出击时以惨败告终。这是他在日本活动时，为苏军四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七)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也笼罩着亚洲。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佐尔格的好友奥特被任命为德国驻日本大使，他立即抓住有利时机，成为德国使馆编外工作人员，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可以说，佐尔格与大使以及使馆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日本和满洲局势的发展，偶尔也会涉及苏联问题，因为人们隐隐感到苏联将成为德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但是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战争的日程表。1939年底，日本和德国再次摆开谈判桌，目的是缔结政治、军事同盟。佐尔格、尾崎和另一位小组成员宫木竭尽全力搜集有关情报，尽量摸清谈判的内容。

1个月后，苏联收到了佐尔格详尽而准确的报告。上面写着：“德国的主要意图是使日本承担在远东反对英国的责任。而此时日本拒绝考虑与德国缔结针对英国的条约。”根据这份极有价值的情报，苏联方面明白了日德谈判是针对英国而不是苏联，便下决心答应德国最近提出的谈判要求，最后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尽管如此，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却不能降至零。就在苏德签订中立条约的同时，佐尔格接到新的指示：就日本陆军的战备状态、师的数目及其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作出详细报告。佐尔格、尾崎和宫木一起将搜集的点滴材料综合起来，精心绘制成一张大表。根据1941年初的形势，几经修改，大致可以得出日军进入完全作战状态的情形。苏联方面对此表如获至宝，有了它，等于在太平洋战争之初就掌握日军战备的全部情况。

1941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希特勒的战略地图上又新插了很多面万字旗，而下一个攻击箭头正渐渐逼进他的一颗眼中钉